

甲骨文与商代文字

文 / 王双庆 杨鑫

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，维系着华夏民族、炎黄子孙的灵魂，有着悠悠数千年的历史。目前发现的最早成体系的汉字当属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，距今已三千多年。因甲骨文的主要时限为商代，人们常把甲骨文等同于商代文字，并将两者混为一谈。其实商代文字除甲骨文外，还有金文、简牍文字、陶文、玉石文等。这些文字之间应该是相互平行的关系，只是书写工具、文字载体不同，风格迥异。当然，甲骨文因目前发现数量最多，可以看做商代文字的主要代表。理清甲骨文与商代文字的关系，无疑会加深我们对甲骨文的了解，也有助于廓清中国汉字早期发展演变的线索。



牛肩胛骨



龟腹甲

不同载体的商代文字

历经三千多年的沧桑巨变，能在地下埋藏至今并被田野考古发掘出的商代器物已属难得，上面有文字的更是凤毛麟角，愈发显得珍贵之极。通过目前的考古发现，我们有机会领略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、玉石文等不同载体的商代文字的魅力。

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文字资料，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，这是商代文字遗留下来的最完备、最丰富的实物资料。目前发现甲骨文单字约 4500 个，已释读的近三分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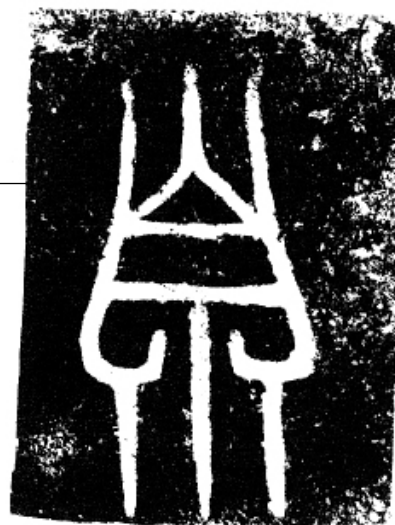
甲骨文中不仅有许多象形字、指示字和会意字，而且还有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，基本能够完整地记录当时的语言，已是相当成熟的汉字。甲骨上的文字，多是青铜刻刀在甲骨上契刻而成，故而笔画纤细、多方折，字体看起来遒劲有力。

金文是商周时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，又称吉金文字、彝器款识、钟鼎文等。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字数较少，一般仅有几个文字，直到商代晚期才出现少数较长铭文。内容主要是族氏名号、先人庙号及作器者名，有一些铭文内容可以和甲骨文相互印

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相传 1899 年，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“龙骨”上发现有契刻符号，由此揭开甲骨文大发现的序幕。后来经过罗振玉等人的查访，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。早期收集殷墟甲骨的有王懿荣、刘鹗、王襄、孟定生等，尤以罗振玉用力最勤、所获最丰。自 1903 年起，美国人方法敏，英国人库寿龄、金璋，德国人维尔茨、卫礼贤，日本人三井源右卫门、林泰辅等纷纷染指其事，其中又以加拿大人明义士所获最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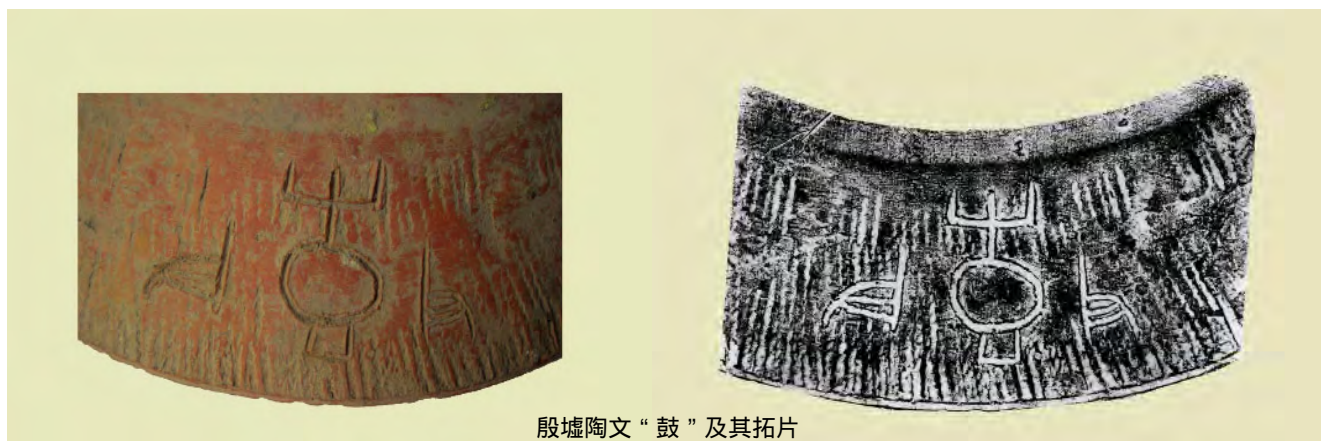
息鼎



息鼎的铭文

证。商代金文单字约 1300 个，可释读的不到二分之一，未能释读的多为人名、地名和族徽等。金文多是铸成的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字形较为象形，笔画浑厚、粗细不等，许多字中常出现或方或圆的团块形。

陶文，指刻画、戳印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。除安阳殷墟遗址之外，在郑州二里岗、江西清江吴城、河北藁城台西等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些商代陶文。商代陶文字数较少，一般只有几个字，且大都刻画在陶器的口部、器壁或底部，内容多表示人名或族氏名、干支纪日、纪数及特殊图像符号等。目前发现的殷



殷墟陶文“鼓”及其拓片



妇好墓出土石牛

鹿头骨刻辞



妇好墓出土石牛的铭文拓片

妇好墓于1976年由郑振香、陈志达主持发掘，是殷墟遗址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。该墓长5.6米，宽4米，深7.5米，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“母辛宗”的享堂。随葬品极为丰富，共出土青铜器、玉器、宝石器、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。其中出土的石牛下颌处刻有“后辛”二字。“后辛”为商王武丁配偶之一，其生前称“妇好”，去世后庙号为“辛”，“后”是武丁之子对妇好的尊称。“后辛”又见于妇好墓出土的有铭铜器。

墟陶文单字有一百多个，其中可释读的已达半数。

玉石文是指刻写于玉器或石器之上的文字。相对于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来说，现存商代玉、石器上文字的数量还比较少。一方面是由于玉、石器的质地大多比较坚硬，不便作为记录语言的载体，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玉、石器多为贵族们珍藏的艺术品，追求的是图案、造型的和谐。

上述四类商代文字中，甲骨文在单字数量、可释字数、记录内容等方面都

远胜于其他文字，并自成体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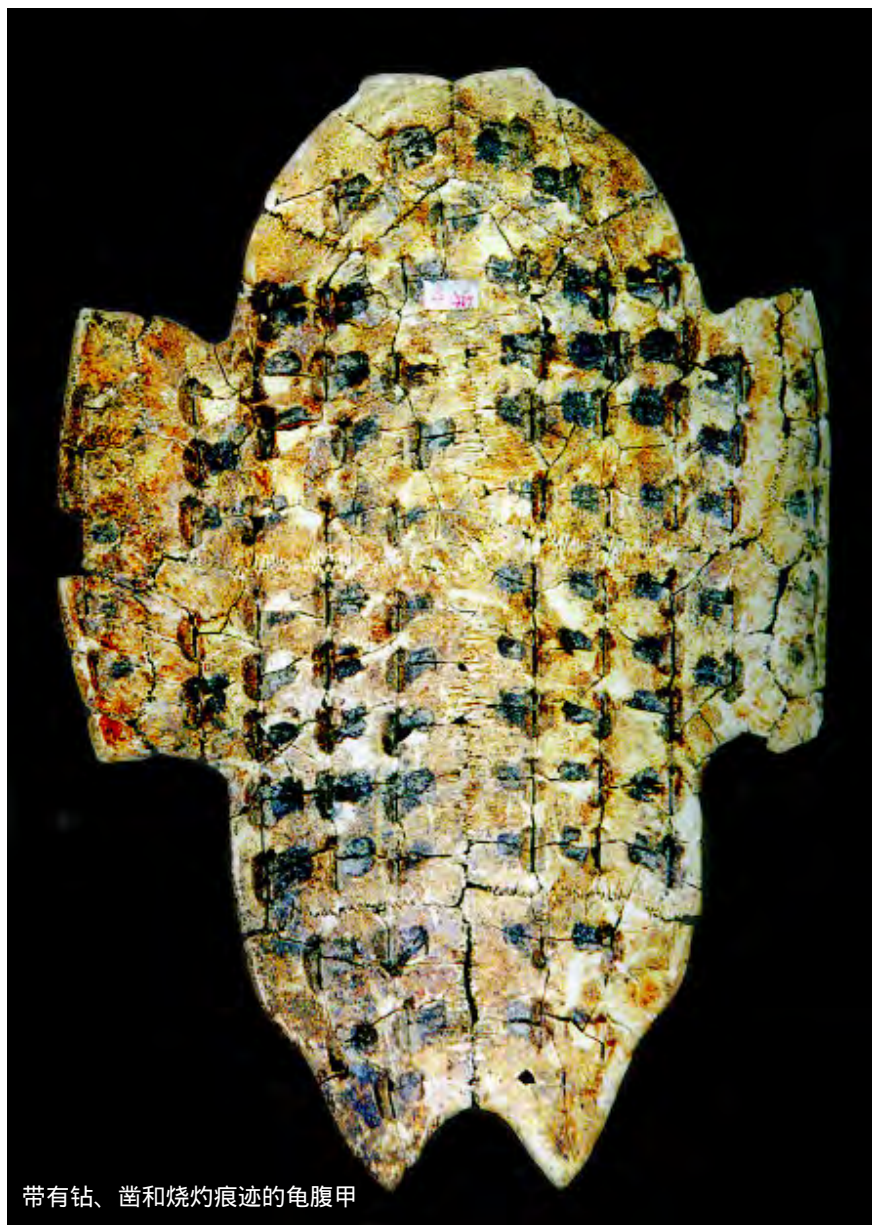
对甲骨文的梳理

为加深对甲骨文的了解，我们从甲骨文的功能、材质、使用时限与区域、整治过程、记载内容等诸多方面对甲骨文做一简要的梳理。

占卜，作为一种迷信风俗，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。但在先秦时期，人们却认为其非常灵验。“王者决定诸疑，参以卜筮，断以蓍龟，不易之道也。”

占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尤其殷商统治者十分重视占卜，凡事均占卜，可谓是无日不占，无事不占。甲骨文的功能便是记录占卜内容。

甲骨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龟甲和兽骨，龟甲以腹甲为主，也有背甲；兽骨主要指牛肩胛骨，也有少量的鹿骨、虎骨、犀牛骨等，甚至还有人头骨。商代占卜所用的龟主要来自远方的贡物；所用牛肩胛骨基本为本地所产。商王在用牛祭祀以后，有的祭祀之牛的肩胛骨



带有钻、凿和烧灼痕迹的龟腹甲

就被保存下来，供占卜之用。

甲骨文的使用时限主要为商代晚期，其时代大致在公元前 14 至公元前 11 世纪。商代甲骨文除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大宗外，在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王城遗址、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中晚期遗址也有出土，但数量有限。

殷商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，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整治，使之成为占卜专用的版式。整治包括取材、锯削与刮磨、钻凿制作等多道工序。占卜时把整治好

的甲骨拿来，在背面进行灼烧，然后正面便出现纵横不同的裂纹，贞人（商代掌管占卜活动的官吏）或商王根据纹路走向进而判断吉凶，然后把所问之事或占卜结果契刻在甲骨上，这就完成了占卜的过程。研究表明，商王朝对占卜的重视程度和占卜工艺之考究，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。

殷墟刻辞甲骨迄今出土已多达 10 余万片，甲骨文所记录的占卜又称为卜辞，也有少数的记事甲骨，只是所占比



河南郑州小双桥朱书陶文“三”字

例特别少，约占百分之一，可以忽略不计。人辞主要记录了当时的统治者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，反映了祭祀先祖、征伐、年岁、田猎、出行、疾病、生育、营造、梦幻、家族、俘虏等殷商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是研究商代社会弥足珍贵的资料。

简而言之，甲骨文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占卜内容，随着商王朝的覆灭，甲骨文也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战国时期的墨子在《墨子·兼爱》中谈到：“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？子墨子曰：‘吾非与之并世同时，亲闻其声，见其色也，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’”由此可知，在当时记事的文字并非专指甲骨文，而应是以简牍为主的多种载体。

简牍文字为商代主体文字的推断

简牍文字是指用毛笔在竹木简上书写的文字，是在纸张发明和普及前最主要的书写载体。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简牍是 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东周竹简，其年代在公元前 433 年左右。



作册祝鼎及其铭文拓片



但简牍始于何时,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简牍的出现不晚于甲骨文,甚至早于甲骨文。郭沫若曾在《奴隶制时代》中提到:“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,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。”王国维在《简牍检署考》里也提出一个观点:“书契之用,自刻画始。金石也,甲骨也,竹木也,三者不知孰为后先,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。”我们现从简牍文字的书写工具、文字载体、文字排列方式、文献传承等方面对这一推断略加说明。

甲骨文除了契刻之外,还出现了朱书和墨书的痕迹,这就证明了在商代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书写用的毛笔和朱砂、墨等文具和材料。董作宾在《甲骨学五十年》一书中提到:“工具中最重要的是毛笔所写字迹的发现,这是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。笔顺起讫,笔锋

收敛,十分清楚。”在商代其他一些器物如将军盔、玉戈、陶器上也发现一些书辞。可见,当时的主要的书写工具并非刻刀,而是毛笔。甲骨文、金文中已出现了表示毛笔的“聿(聿)”字,“聿”是“笔”的本字。《说文解字·聿部》:“聿,所以书也。”这是一个会意字,由手和毛笔两个部件组合而成,表示用毛笔写字。同时也出现了以“聿”为字根的字,如“畫(画)”、“律”、“建”等。

另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大量出现了表示竹简的“冊(册)”字,“册”字像绳子连缀起来的竹木简,象征着一捆竹简。还有以“册”为字根的许多字,如典(典)、嗣(嗣)、仑(仑)、𠔁(𠔁)、𠔁(𠔁)、𠔁(𠔁)、𠔁(𠔁)等,还有一些未能释读出来的字,如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等。《尚书·多士》说:“惟尔知,惟殷先人,

有册有典,殷革夏命。”就是说,当初商朝推翻夏朝的时候,就有史官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在“册”与“典”上面,而不是记录在甲骨片上面。显然,不仅在周代,夏末殷初的史官们应该已经用简牍来记录史实了。例如商王和各方国均设有“乍册”这一官职,负责起草政令,宣扬王命。在金文族徽文字中也出现了以“册”为构件的族徽,如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、𠔁等,在一件青铜钺上,一只兽面纹的左耳由册字取代,“册”对当时人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从文字的排列方式上来看,商代已基本形成了自上到下再从右到左的排列方式,而且甲骨文中有些字为了适应直行排列的需要,已经改变了字形原来



戊嗣鼎及其铭文拓片

应有的方向。如𠂔(犬)、𠂔(豕)、𠂔(虎)、𠂔(象)、𠂔(万)、𠂔(鱼)等字都变成脚腾空尾着地了。有些比较复杂的表意字也都采用了这种方式。这种书写方式习惯的形成当源于竹简比较狭长的书写需要。钱存训在《书于竹帛》一书里曾谈到：“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考，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、书写材料、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。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，如人体、动物、器皿，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；毛笔书写的笔顺，大多是从上到下；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，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，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。”

甲骨文的书写形式虽然是多样的，但以自上而下为主要模式。在商代为数不多的长篇金文中，几乎所有的文字排列都是自上而下再从右到左的，金文这种排列方式显然也应是受简牍的书写形式影响使然。

在甲骨文未发现之前，人们对商代

文字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料记载。甲骨文因商王朝的灭亡而逐渐归于尘土，人们对商代及以前历史仍然能够通过《史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文献而略知梗概。通过甲骨文的印证，可知这些史籍所载内容基本可信。而这些史料又是如何传之后世呢？答案应该就是简牍。可以说，简牍文字在商代社会已得到广泛应用，范围包括典章制度、历史记载、卜筮术数、文告诏令、经济文书等诸多方面。因时代久远，现在尚未发现商代简牍实物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简牍文字的认识。

商代的几种文字，各有其具体的用途。简牍文字主要用于历史典籍和政事活动，是一种日常使用的文字；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，是一种宗教用途的文字；金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，记载做器人的身分和做器目的；陶文和玉石文亦各有所用。这几种文字适用范围不同，相互之间可以看成是一种平行的关系，是商代文字因不同书写工具作用于不同

文字载体而形成的不同风格，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人为地将其分为几种文字是容易引起误会的，从文字学角度来看也是不合理的。

人们习惯说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，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商代文字材料几乎全部是甲骨刻辞。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一种形式，通过甲骨文来认识商代文字，解读汉字早期的发展演变是一种方法和途径，但将商代文字和甲骨文之间划等号，则是不准确的。^[A]

（作者王双庆为中国文字博物馆馆员；杨鑫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助理馆员）

- 龟腹甲、牛肩胛骨、鹿头骨刻辞，带有钻、凿和烧灼痕迹的龟腹甲 图片来源：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管理处《殷墟》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，2008年。
- 息鼎、作册祝鼎，图片来源：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《中国青铜器全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殷墟遗址出土商代陶文“鼓”，安阳焦氏私人收藏。
- 妇好墓“后辛”石牛，图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妇好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郑州小双桥朱书陶文“三”，图片来源：宋国定《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第5期。
- 戊嗣鼎，图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发掘报告（1958-1961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。